

现状、变化和相互关系： 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及其提升路径

王俊秀 刘晓柳

内容提要 通过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10多年来全国居民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变化。用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了安全感和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并用2018年获得感调查数据分析了获得感的结构、现状和特点,通过社会心态调查和获得感调查的追踪样本分析了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安全感 获得感 幸福感 社会心态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9.01.006

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100732

刘晓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 100732

一、引言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惊人,短时间内国内崛起了规模惊人的现代都市群,城乡社会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快速交通缩短了空间距离,增加了人们的流动性;中国的信息化程度在不断提高,深刻改变了寻常百姓的生活。社会的快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带来不同的社会心态,中国民众在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心态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1]。这一社会政策的提出表明,我党已把人民的幸福明确为政府执政的目标。过去的40年,作为社会心态重要指标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提升社会安全感、获得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16ZDA231)阶段性成果。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感和幸福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本研究根据国内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和获得感调查数据，对近年来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特点和变化进行分析，尝试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寻找提升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有效路径。

本研究将分别分析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变化和现状。其中，反映变化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从这些持续调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近十几年来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变化。而反映这方面现状的数据则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由于获得感是一个新的概念，以往没有相关调查数据，因此本研究将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2017年到2018年对获得感基本概念建构、获得感量表编制和获得感现状调查的成果。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一般社会调查数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在抽样方法和调查工具、量表尺度上都存在差异，因此，分析中笔者分别分析安全感、幸福感变化数据和现状数据，前者主要看历年的变化趋势，后者主要看现状中各方面安全感的差异，以及不同群体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差异。

二、安全感的概念、变化和现状

1. 安全感的概念 安全感(security)是许多学科共同使用的概念，心理学认为安全感是个体的一种人格特质，犯罪学认为安全感是一种对犯罪的恐惧，而社会学关注的是以集体焦虑和普遍的社会不安全感为标志的新的社会形态或“风险社会”。也就是说，作为社会心态指标之一的安全感，并不是作为一种人格特质，而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个体对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的感受。

维尔^[1]认为，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可以从个人、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等几个方面来描述，每个方面都有像光谱的两极，分别代表安全和不安全。(1)个人安全感或不安全感是对健康、充足的食物，家庭、工作场所和社区等环境的安全或不安全感受；(2)经济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包括：金融是否安全，工作是否安全，个人财产权利、土地使用和投资是否受到保护；(3)社会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强调的是对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水平的感受；(4)政治安全感或不安全感包括公共秩序是否得到保障、政治组织的合法性是否能得到保护、国家安全与否等；(5)环境安全感或不安全感主要是指社会成员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安全或不安全的感受。因此，笔者在2006年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和谐稳定问题全国抽样调查”安全感部分调查时借鉴了维尔安全感分类，即将安全感分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安全。近年来，我们又增加了环境安全的内容。

2. 安全感的变化趋势 表1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在2006年、2008年、2013年和2015年获得的安全感数据，其中生态环境安全感和总体社会安全是2013年加入的^[2]。安全感调查题目是“您觉得当前社会中以下方面的安全程度如何？”，采用4点量表计分，1代表“很不安全”，2代表“不太安全”，3代表“比较安全”，4代表“很安

表1 CSS调查安全感历年得分

	2006年	2008年	2013年	2015年
财产安全	2.95	2.98	3.05	3.07
人身安全	3.02	3.04	3.06	3.08
交通安全	2.74	2.74	2.69	2.74
医疗安全	2.73	2.84	2.84	2.86
食品安全	2.68	2.76	2.35	2.40
劳动安全	2.98	2.97	2.83	2.90
信息隐私安全	3.09	3.02	2.70	2.71
生态环境安全	/	/	2.71	2.81
总体社会安全	/	/	2.84	2.92

[1]Vail, J., "Insecure Times Conceptualising Insecurity and Security", in Vail, J., Wheelock, J., and Hill M.(eds), *Insecure Times: Living with Insecur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Multistage Composed Sampling)的方法，即分县/市/区、居委会/村委会、居民户、居民4个阶段抽样，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和入户问卷访问方式，共访问了约1万名称乡居民。

全”。从表1可以看到安全感历年的变化情况:财产安全 and 人身安全感呈现微弱上升的趋势;交通安全感变化不大,仅在2013年略有下降;医疗安全感略有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劳动安全感整体上呈现的是微弱下降趋势,2013年的调查平均分最低;信息隐私安全感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和2015年的得分非常接近;食品安全感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最大。再进一步查看历年各项安全感得分可发现:食品安全感是各项安全感中得分最低的,食品安全感在2006年与医疗安全、交通安全的得分接近,但到2015年与上述两者的差距已经很大了;信息与隐私安全在2006年是最高的,但到了2013年就已经下降明显,并与交通安全接近,排在第三低的位置;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在历年的调查中都处在较高的水平;2013年开始调查的生态环境安全得分不高。

3. 安全感的现状和特点 2016年8月到2017年4月,中国社科院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通过数相科技(Matview)研发的问卷调研APP“问卷宝”进行了社会心态调查(CASS-Matview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1]。值得一提的是安全感是这次社会心态调查的一个内容,安全感的测量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针对整体社会安全感的测量,使用1个题目,测量采用里克特式7点计分,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受评价对总体社会安全感的担心程度(1=“非常担心”,7=“非常不担心”)。样题包括:“总体上的社会安全状况”。第二个部分是具体安全感,测量个体对具体各个方面社会安全感的担心程度,使用8个题目,要求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受评价对各个社会安全方面的担心程度(1=“非常担心”,7=“非常不担心”)。由于这次调查统一采用的是7点量表,且抽样方法和样本分布都与上述的CSS调查不同,因此可以看到,本次调查的安全感各项得分(表2)与表1中安全感各项目得分存在较大差异,但分别比较两次调查项目之间相对得分和高低排序会发现,两次调查的结果非常接近。安全感最低的都是食品安全,其次是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安全,排在第三和第四的分别是环境安全和交通安全,不同的是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中环境安全感更低。接下来的是医疗安全和劳动安全,以及总体的社会安全。安全感最高的还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不同的是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中财产安全感更高。

分析不同群体的安全感得分可发现,男性的安全感高于女性,并且差异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

此外,不同年龄的个体在安全感上存在显著差异。在人身安全上,1949年前出生的人平均得分最低,为4.21;其次是“90后”,为4.25;排在第三的是“50后”,为4.30;而“70后”得分最高;其余各组的平均得分接近。在财产安全上,1949年前出生的人平均得分最低,为4.33;

其次为“50后”群体,为4.47;排在第三位的是“00后”,为4.57,与“80后”的4.58相近;财产安全感排前三位的分别是“70后”“90后”和“60后”,分别为4.68,4.66和4.63。医药安全感整体趋势是年龄越大安全感越低,最高的是“00后”,其次是“90后”,平均得分分别是4.28和4.08;“60后”“70后”和“80后”得分接近,分别是3.79、3.76和3.82;“50后”和1949年前出生组的平均得分最低,分别为3.71和3.73。各年龄组在交通安全感上的得分差异不大,得分排名靠前的是“00后”“60后”和1949年前出生组,得分分别为4.14、4.08和4.00;得分排名居后的是“80后”和“50后”,得分分别为3.87和3.88。劳动安全感得分

表2 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安全感项目得分

序号	题目	均分	标准差
1	总体社会安全状况	4.31	1.28
2	人身安全	4.50	1.32
3	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	4.63	1.30
4	个人信息安全	3.51	1.59
5	医疗药品安全	3.97	1.38
6	食品安全	3.46	1.48
7	交通安全	3.95	1.38
8	环境安全	3.63	1.47
9	劳动安全	4.21	1.33

[1]这个调查通过覆盖全国346个地级城市约110万人的在线样本库,根据地域按比例抽取用户推送问卷,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24364份,经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成人问卷22669份,问卷有效率为93.04%。在110万人的样本数据库中,男性样本11840人,占52.2%;女性样本10829人,占47.8%,性别比例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男性人口51.27%,女性人口占48.73%)相比,男性比例略高,但没有显著差别。年龄范围是18~70岁,平均年龄 27.38 ± 8.28 岁。

靠前的是“00后”和1949年前出生组,得分分别为4.45和4.36;安全感得分居后的是“70后”“80后”和“90后”,得分分别是4.24、4.15和4.23。环境安全感得分最高的是“00后”,得分为4.02;其次是“90后”和“60后”,得分分别为3.73和3.64;得分靠后的是“50后”“70后”和“80后”,得分分别为3.37、3.47和3.47。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感最高的是“00后”,其次是“90后”和“60后”,得分分别为3.98、3.59和3.55;得分最低的是“50后”,其次是“80后”和1949年前出生的人,得分分别为3.25、3.36和3.36。食品安全感最低的是“70后”,其次是“80后”和“50后”,得分分别为3.24、3.30和3.31;食品安全感得分最高的是“00后”,其次是“90后”和“60后”,得分分别为3.88、3.55和3.48。所有各组差异都非常显著。

尽管并非一一对应,但整体上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安全感的得分表现为不断增加的趋势: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群体在各项安全感平均得分中都最低,教育程度为博士的群体安全感平均得分最高,拥有中等教育程度的群体安全感平均得分处于中间水平。总之,安全感各项目上各组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安全感并非随收入水平的提高呈完全线性的递增,但整体上来说,收入高的群体相对来说安全感的得分也更高,并且各收入组在安全感各项上差异显著。

三、获得感现状

1. 获得感的概念和结构 近年来,获得感这个概念在政府工作中不断被提及,但我们却还没有看到关于获得感的官方定义,以及获得感包含的主要内容。为了了解民众是如何理解获得感的,我们进行了历时一年的研究,并于2018年3月2日发布了“民众获得感调查(2018)”报告,这个报告在国内首次对获得感的概念、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

本次获得感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采用字词联想、原型枚举等心理学研究方法,了解民众如何理解“获得感”,建构获得感的概念,编制获得感量表,探讨获得感结构。2017年1月和3月,我们采用自由联想方法分两次实施调查,请民众围绕“获得感”充分展开联想,共获得了12952个有效词语。2017年6月又进一步采用原型枚举方法,请民众写出最能揭示“获得感”内涵的词语,共得到1334个有效词语,累计频次5688个。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了155个高频词,请501位民众结合自己对“获得感”词语的理解,评价这些词语与“获得感”的关联。并采用因素分析方法,探索获得感的概念结构。

研究结果发现,民众心中的获得感概念表征主要涉及5个方面。一是获得的内容,既包括物质条件的获得,比如收入、金钱、加薪等,也包括成就性成果的获得,比如事业成绩、荣誉等;二是获得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为满足民众需求所创设的现实条件,比如公平、安全、反腐、共享、合作等;三是获得体验,伴随民众需求得到满足时的积极心理体验,比如幸福、愉快、知足等;四是获得途径,即民众追求需求满足过程中的自主性,比如努力刻苦、勤奋等;五是获得与分享,主要是感恩得到帮助、乐于助人和同甘共苦等。由此我们发现,民众理解的获得感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通过个体努力,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得到一定提升、肯定和奖赏后产生的认知和情绪体验。

此次获得感研究的第二阶段是选择典型的获得感测量项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了解当前我国民众的获得感现状和特点,并初步探索获得感的影响因素。

2. 获得感的现状和特点 为了了解民众当前的获得感状况,我们选取了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16个方面,分别从这些方面的重要性、当前获得程度和未来获得预期三个方面进行调查,这16各方面的内容包括:良好的教育条件、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可靠的社会保障、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环境、优美的生活环境、丰富的文化生活、完善的公共服务、安全的生活环境、民主、法

制、公平、正义、受人尊重、社会安定有序。问卷采用里克特式7点评分方法^[1]。

调查结果显示,过去五年,在民主、优美的生活环境、公平、良好的教育条件以及社会安定有序方面,民众的获得感较强;在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完善的公共服务、法制、正义以及满意的收入方面,民众的获得较弱^[2]。

未来五年,民众对民主、公平、安定的生活环境、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以及稳定的工作方面的获得预期较高;而对法制、正义和可靠的社会保障方面的获得预期较低。

民众普遍认为安全的生活环境、社会安定有序、法制、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可靠的社会保障方面非常重要。

如果根据民众对各方面获得程度的评价和该内容重要性程度进行分类,可以得到四种类型,分别是:(1)高重要性-高获得方面,包括:安全的生活环境、社会安定有序、法制、良好的教育条件、可靠的社会保障;(2)高重要性-低获得方面,包括: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稳定的工作、公平、满意的收入;(3)低重要性-高获得方面,包括:受人尊重、完善的公共服务、舒适的居住环境;(4)低重要性-低获得方面,包括:民主、正义、优美的生活环境、丰富的文化生活。

同样地,根据内容的重要性和未来获得可能性民众获得感也可以分为四类:(1)高重要性-高预期方面,包括:安全的生活环境、社会安定有序、法制、可靠的社会保障、良好的教育条件;(2)高重要性-低预期方面,包括: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满意的收入、公平、稳定的工作;(3)低重要性-高预期方面,包括:优美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公共服务、舒适的居住环境;(4)低重要性-低预期方面,包括:受人尊重、正义、丰富的文化生活、民主。

四、幸福感的理念、变化和现状

1. **幸福感的概念** 幸福感是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这一研究的发展过程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从心理学研究逐渐扩展到精神卫生、教育学、组织管理、经济学、政治学、政府管理等领域的研究;二是从学术研究扩展到社会政策研究;三是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研究扩展到社会幸福感研究,进而发展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的研究。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从发展的角度看幸福已逐渐成为政府和人民普遍接受的理念。因此,社会心态研究关注幸福感是从宏观的视角了解社会民众的幸福现状和发展,可为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把握方向。

2. **幸福感的变化趋势** 尽管现在主观幸福感已经被心理学、经济学所普遍接受,并逐渐被人们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由于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有不同的方法,与心理学采用量表不同,社会学和经济学经常采用单题测验。本研究分析主观幸福感变化所使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因在2003年、2005年、2006年、2010年、2011年、2012年、2013年、2015年的数据中均有询问个体在总体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可用于作为幸福感的测量指标。在调查中,要求个体使用5点计分(1=非常不幸福,2=不幸福,3=一般,4=幸福,5=非常幸福)来评价自己的“总体生活”。

从图1可以看到,从2003年到2011年,民众幸福感稳步上升,到2011年达到了顶点,在2012和2013年有所下降,到2015年又有所回升。

[1]具体内容见谭旭运、王俊秀、张若玉:《民众获得感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分析》,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2]豆雪蛟、董洪杰、谭旭运:《主客观社会地位对民众获得感的影响》,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从表3可以看出,从2003年到2015年,选择“非常不幸福”的比例变化不大;选择“不幸福”的比例在2005年最高,以后基本保持稳定略有下降;选择“一般”的比例从2003年的接近半数,经历了2005和2006年的缓慢下降后,在2010年出现了大幅下降,到2015年为14.7%;越来越多的个体不再选择“一般”而选择“幸福”和“非常幸福”,即选择幸福的比例从2003年的32.3%增加到2015年的60%,几乎增加了一倍;选择“非常幸福”的比例从2003到2006年都稳定在5%左右,2010年开始上升到16.0%,2011年达到了20.3%,之后在2015年为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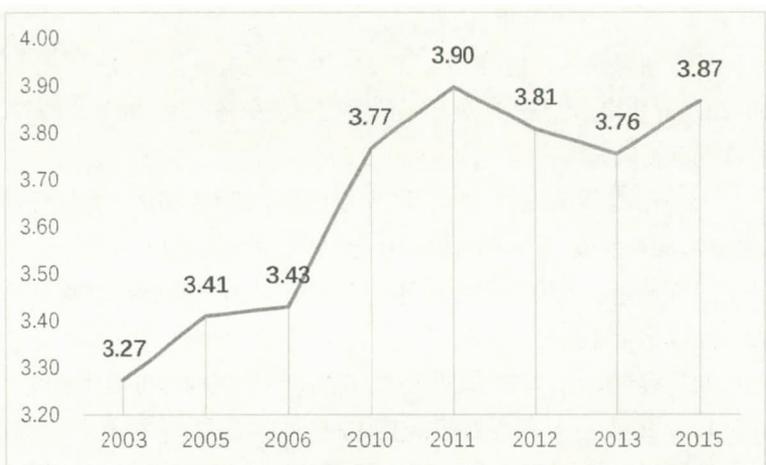


图1 CGSS调查中幸福感历年变化

表3 历年不同幸福感的比例(百分比)

	2003	2005	2006	2010	2011	2012	2013	2015
非常不幸福	2.3	1.4	1.0	2.1	2.0	1.5	1.6	1.3
不幸福	10.5	7.7	6.7	7.7	6.6	7.4	7.4	6.3
一般	49.8	45.1	46.1	17.7	11.4	15.9	18.7	14.7
幸福	32.3	40.1	40.6	56.5	59.6	59.2	58.5	60.0
非常幸福	5.1	5.7	5.5	16.0	20.3	16.0	13.8	17.8

3. 幸福感的现状和特点 生活满意度一直被视为等同于主观幸福感或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方式。为了更深入地研究,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中心使用了Diener等人^[1]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该量表采用5个题目来测量个体对其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测量采用里克特式7点计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感受评价(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

在22669个有效样本中,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4.05,标准差为1.20。女性的幸福感得分为4.11,显著高于男性的4.00。不同年龄群体的幸福感均值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态势,“00后”的幸福感均值为4.30,仅次于“40后”的幸福感均值4.32,幸福感排名靠后的是“90后”“80后”和“70后”,幸福感均值分别为4.03、4.07和4.09,“60后”和“50后”的幸福感均值分别为4.20和4.27。

整体趋势上,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的得分也越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中专(包括技校和职高)和大专这些文化程度的群体相对幸福感得分较低,分别为3.95、4.05、4.01和3.98,而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群体的幸福感均值得分分别为4.10、4.24和4.42。

同样地,个人的月收入越高,主观幸福感的平均得分也越高,个人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群体幸福感得分较低,均值得分都在4.06以下,5001~7000元、7001~10000元、10001~20000元和20000元以上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均值得分分别为4.16、4.22、4.36和4.38。

此外,不同地区的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差异,主观幸福感最高的两个地区为东北地区和华东地区,得分分别为4.13和4.09,华中地区、华北地区、西南地区、华南地区紧随其后,各地区之间幸福得分差异并不大,最靠后的是西南和华南地区得分均为4.00^[2]。

[1]Diener, E., Emmons, 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1985, 49(1), pp.71-75.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52jpa4901_13.

[2]刘晓柳:《不同地区幸福取向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五、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

上面我们分析了许多的数据,那么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从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上来看,获得感与幸福感在意义上比较相近,不安全感与获得感和幸福感应该是一种反向的关系,那么安全感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这需要实证研究来探索,由于国内目前还没有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测量的数据,也没有看到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使用2018年获得感调查中得到的社会心态调查的1762个跟踪样本,分别考察了获得感总分、获得感各维度与安全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表4即为社会心态调查和获得感调查的共同样本合并后的相关分析。

表4 获得感及各维度与安全感、幸福感的相关分析(N=1762)

	幸福感	安全感	获得环境	获得内容	获得体验	获得方式	获得分享	获得感
幸福感	1							
安全感	0.435***	1						
获得环境	0.280***	0.259***	1					
获得内容	0.052***	0.005	0.404***	1				
获得体验	0.451***	0.272***	0.591***	0.268***	1			
获得方式	0.204***	0.134***	0.496***	0.572***	0.477***	1		
获得分享	0.101***	0.066**	0.489***	0.685***	0.354***	0.680***	1	
获得感	0.313***	0.211***	0.796***	0.718***	0.755***	0.804***	0.786***	1

注:***p<0.001。

从表4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正如我们从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意义关联分析得到的二者意义相近的结论,实证分析发现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13,也就是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安全感与获得感、幸福感之间都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不同:安全感与获得感的相关系数为0.211,小于安全感与幸福感的相关系数;安全感与幸福感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435,为三者之间最高。根据我们的研究,获得感是一定时期人们在获得环境、获得内容、获得体验、获得方式和获得分享上感受到的变化,与幸福感相比,获得感更为具体,也更具情境性,幸福感则是在一定时期感受到的人生满意与否的体验,更具持续性和人生意义感。从安全感与获得感、幸福感的相互关系中可以发现,安全感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性更强,也就是幸福感越高的人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体会到的安全感也越高,或者安全感高的人也会体会到更高的幸福感,虽然安全感与获得感也是这样的相关关系,但关联没有安全感与幸福感强,也就是说安全感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可能高于获得感。

进一步考察安全感与获得感各维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安全感与获得体验、获得环境的相关性排名居前,且极其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272和0.259;安全感与获得方式之间的相关为0.134,安全感与获得分享之间相关极低,安全感与获得内容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前文已经表明,获得的内容包括物质条件的获得,如收入、金钱、加薪等,也包括成就性成果的获得,如事业成绩、荣誉等。研究发现,获得的内容并不影响安全感的高低,影响安全感的是作为为满足民众需求所创设的现实条件的获得环境,包括公平、安全、反腐、共享、合作等,以及伴随民众需求得到满足时的积极心理体验的获得体验,如幸福、愉快、知足等,这一发现对于我们理解、制定社会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类似的发现也出现在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获得内容与幸福感之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研究发现获得体验对幸福感的影响最大,获得体验与幸福感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451;获得环境和获得方式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280和0.204,获得分享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101。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而且进一步分析获得感的

不同维度对于理解获得感与安全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

六、提升民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建议

如何提升民众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首先要从这三感之间的关系来考虑，根据以上对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分析，我们分别提出一些提升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建议。

1. 防范民众生活风险，提高民众安全感 在大众风险意识普遍提高的今天，虽然不安全感与不安全的、危险的环境有关，但很多时候不安全感是人们对于环境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焦虑，它是由之前发生的一些危险事件和风险事件引起的。在网络社会，风险信息的传播非常广泛，对安全感影响的风险事件多数并不发生在身边，这就为安全感的提升增加了难度。防范风险是提高安全感的重要途径，应该转变重危险、重灾难而轻风险的观念，比如政府管理部门愿意把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在应急管理上，用在摆脱危险、降低危险程度上，却不愿意用于防范风险，这是应当予以修正的。

最近10多年，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人身安全感和财产安全感较高，这是政府部门强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格化管理取得的成效。但同时付出了很高的人力成本和财力成本，因此今后的社会治理应该在科学化和以人为本方面做更多探索。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国内一些城市也开始把心理服务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相结合，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譬如江西赣州市的实践^[1]中的一些经验，就可以在全国推广，它对于有效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和效果，提升民众安全感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调查还发现，总体来说全国的医疗安全感和劳动安全感有所提高，但不时爆发的医患纠纷和医疗卫生事件使得人们的安全焦虑难以消除，甚至会出现反复。如2018年7月发生的震惊全国的疫苗事件再一次引发了全社会的恐慌和对于医疗安全的担忧。中央政府应该以这样的风险事件处理为契机，从制度上完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医疗卫生管理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对各环节的有效监督，确保各环节的可回溯性，明确管理责任，重视舆论监督和其他社会监督，防范可能的风险，通过信息公开消除民众不安全感。

有研究表明，影响民众安全感的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风险。正如多年来，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民众的食品安全感不断下降。还有我们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中国北方和西部大面积的空气污染使得人们的环境安全感下降。此外，互联网时代，手机日益成为人们依赖的生活工具，与之伴随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问题也日益突出，再加上电信诈骗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也表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上述三个方面的风险是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政府部门必须花大力气去解决，否则，民众安全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

2. 满足民众的迫切需要，逐步提高民众获得感 从民众理解的获得感看，获得感的内容是广泛的，不仅包括基本的民生方面，如“房子”“汽车”“工作”“金钱”和“财富”代表的基本物质条件，也包括了以“加薪”“升职”和“事业”为代表的自我发展、成长和向上流动的实现，以及在精神上的“荣誉”“荣耀”“成功”“成就”等。社会大众的这些不同层次的需要不是渐次提出的，而是普遍的。这是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体现，政府部门只有切实通过差异化的形式来满足民众需求，才能从整体上提升民众获得感。

民众认为需要的满足要依赖家庭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的改善，而家庭小环境改善是社会大环境

[1]马玉福、秦秀清：《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之“赣州模式”的实践探索》，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改善的基础。家庭和睦是民众幸福的核心,我们的社会政策应该鼓励和引导家庭的自我完善,支持民众营造幸福家庭。此外,社会治理应该通过改善社会环境来保障民众获得感的提升,完善社会安全措施,建构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保障社会公平,增进社会互信,建立诚信社会环境。这中间还包括,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努力实现家庭幸福和睦、邻里守望相助、社会安定有序。

提升民众获得感不仅可以使民众的幸福得到提升,也有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积极的获得感体验是个人自我完善和自我成长的能量,也会成为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提升民众获得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民众获得感的提升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回报和分享,通过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可以激发民众更多的回报社会和与他人分享的行为,真正实现共享的理念。

而从我们研究的结果也可以看到,民众获得感程度是比较高的,但民众对于获得的预期也很高,因此,民众获得感的提升应该重点关注那些民众认为急需的需要,也就是人们觉得重要但获得感不高的方面,比如在法制、高水平的医疗卫生建设、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等方面要加大社会治理的力度,争取逐步加以改善,以稳步提高民众获得感。

3. 不断积累获得感,渐进提升民众幸福感 幸福感应该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状况是否满足的较为稳定的评价和体验,而获得感则更倾向于对一个时期的个人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物质和精神上得到肯定和奖赏的评价和体验,相对幸福感来说获得感更具情境性,而持续性和稳定性则更弱。安全感则是人们对自己需求满足中风险和危险状况的评价,它有助于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安全感是个底线,是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基础,安全感高获得感和幸福感不一定就高,但是没有安全感或安全感低获得感必然不会高,幸福感也不会很高。因此,安全感是幸福感提升的基础。当然,个体的幸福感也受到其自我目标设定和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的影响,但作为社会心态的幸福感一定是来自一个个社会成员不断累积的获得感,因此,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累积的获得感,持续的获得感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是持续幸福感的保证。

总之,社会整体幸福感提升的关键是提升中下层社会成员的幸福,上面分析的近10多年来幸福感的演变特点表明,中等幸福程度人群出现了很大比例的幸福提升,表明我国民众幸福感整体得分在提高,但幸福感处于中下水平的人群幸福感向上迁移的比例不大,这是未来社会治理要解决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幸福感的消除要比整体幸福感的提升更重要,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发展、社会进步意义更大。

参考文献

1. Peterson C., Park N., Seligman, M. E. P.,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Full Life versus the Empty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5, 6(1), pp.25-41.
2. 豆雪姣、董洪杰、谭旭运:《主客观社会地位对民众获得感的影响》,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3. 谭旭运、王俊秀、张若玉:《民众获得感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分析》,见王俊秀主编《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责任编辑:方心清]

The Status Quo, Change and the Dynamics: Sense of Security, Sense of Gain and Sense of Happiness, and the Paths to Enhancement

Wang Junxiu Liu Xiaoliu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the residents' sense of security and sense of happiness in the past decade by using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data CSS and CGSS,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nse of security and happiness by using the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 and analyzes the sense of gain by using the Survey of Sense of Gain in 2018. Based on the common samples of the two previous survey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ynamics among sense of security, sense of gain and sense of happiness,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m.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an Outcome Framework for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on a National Level

Li Bing Li Banghua Sun Wencan

Although in China the policy system of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has basically been established and various policies clearly suggest reinforcing supervision, examinatio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stitutional evaluating measurements and methods are still lacking.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ies of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and improve these policies for their own sake, the system of supervision and examination must be strengthened. For this purpose,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build an outcome framework of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on a national level with reference to good lessons and practices in such countries as the UK and the USA, expecting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healthy trend of China's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e present study consists of five parts: first, the developments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in the world; second, the outcome framework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for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needed in China; third,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outcome framework; fourth, a deconstructive analysis of the framework; and fifth, the selection of the outcome index of performance.

On the Function of Role Models in Rule by Virtue

Chen Jinhua Shan Jie

The key to a pattern of social governanc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is to create a mechanism for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with a combination of rule by law, rule of virtue, and self-rule. Role models, as a mechanism for social governance function, are aimed at guiding rule by law, rule of virtue and citizens' capacity for self-rule by means of empathy, identification, imagination, and practice, and fostering and organizing community residents so that they can become both developers and sharers of public interests rather than onlookers of public affairs. People's increasing need for a better life not only entitles role models with an exogenous fun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but also shows an endogenous requirement for the spirit of role models in the new era.

“Recall (Er-Innerung)” and the Beginning of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Xian Gang

Abstract: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begins with the perceptual certainty of pure being and ends similarly in the absolute knowledge of pure being, and returns to the beginning in this sense. This is the origin of the controversial “we” in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iritual phenomena by “we” is not a subjective assumption of a philosopher, but the “recall” of absolute knowledge about the road that it has ever passed. But Hegel's “recall” (Er-Innerung) is not a subjective imagination too, but a “process deep into the core”. The “recall” or “process deep into the core” and the “externalization” of consciousness are happen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is way, the consciousness brings all kinds of external objects into himself and gradually reaches the highest degree of self-consciousness.